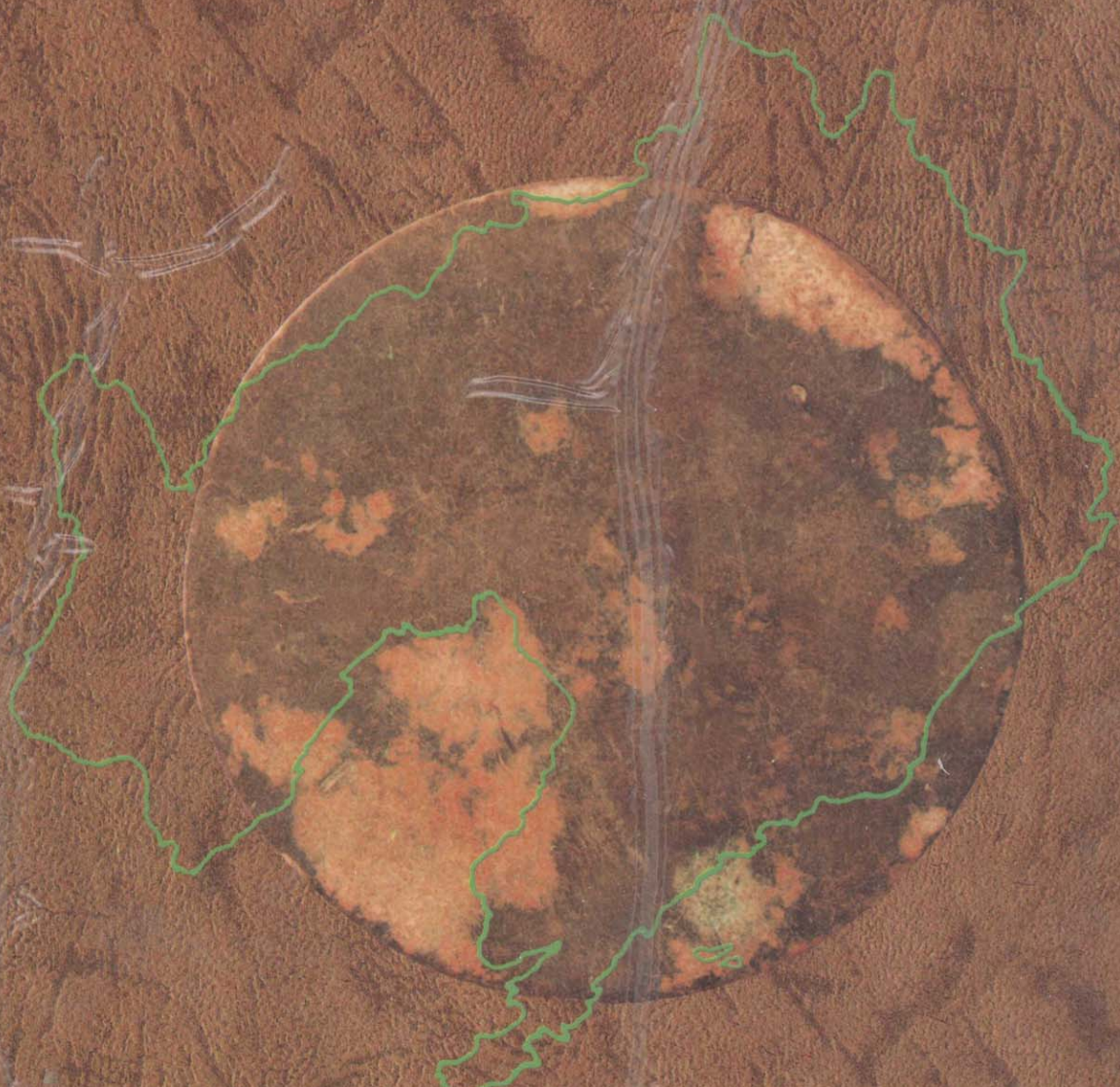


辽宁省志

文物志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宁省志

文苑卷

（清）王士禛撰



辽宁省志

文物志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凡 例

一、指导思想。《辽宁省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真实地记述辽宁省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运动的记述,以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二、断限。上限起于 1840 年,有些内容适当上溯,下限止于 1985 年;本着详近略远的编纂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辽宁省的自然和社会状况。

三、地域范围。自 1840 年以后,辽宁省不同时期行政区划多有变化,且省名也多次变更,故《辽宁省志》地域范围的记述,原则上以 1985 年底辽宁省行政区划为准;对不同历史时期行政区划内事物的记述,均依据当时的行政区划界定;一般泛指时称辽宁地区。

四、纪年。清代以前采用朝代年号纪年,中华民国和东北沦陷时期采用民国纪年,以上均括注公元纪年;鉴于东北解放战争时期辽宁地区解放区与国统区并存的实际情况,1945 年 9 月 3 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可直接使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五、体例与结构。《辽宁省志》原则上按现行省直各部门承担的任务,以事类或近类合并的办法设专业志。各专业志内容编排力求合理,避免重复;间有交叉者,均按各分志特点有所侧重。志书体裁包括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有突出业绩的在世人物以事系人入志。《辽宁省志》结构原则上设篇、章、节、目 4 个层次,事以类从,横分纵述;全志设总述,专业志设概述,篇设简述,章设无题引言。

六、称谓。《辽宁省志》记述使用第三人称。人物称谓,首次出现时加职务称谓,其后一般直书其名;历史各时期的政权、党派、军队、职官等称谓,除日本扶植的伪满政权的机构、党派、军队、职官等,称

谓前加“伪”字外,均按当时名称书写,不冠褒贬之词。地理名称均以当时称谓为准,括注今名称。为简化行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除特殊情况使用全称外,一般以“新中国”代之。

七、语言文字。《辽宁省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并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 年 10 月 10 日发布的《简化字总表》、1988 年 1 月制定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及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5 年 12 月 13 日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执行。数字用法按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5 年 12 月 13 日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执行。

八、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各历史时期计量单位记述,必要时标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九、币制。鉴于辽宁省清末以后各历史时期使用的币制较为复杂,且有些币制无法换算成现代法定币制,因此各专业志中新中国成立前出现的币制均为当时的币制,新中国成立后的币制,一般情况换算为第二套人民币。

十、注释。《辽宁省志》采用页下注和夹注两种形式。一页内只有一注的,用*号标示;一页内有两注以上的,用①、②……标示。

十一、数据。《辽宁省志》各专业志所用数据原则上采用辽宁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统计局缺项的采用主管部门数据。

十二、资料来源。《辽宁省志》资料来源为有关史志文献、档案材料、统计资料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三、凡例。全书设总《凡例》,各专业志有特殊事项需说明者,另加编辑说明,以尽其详。

目 录

凡 例

概 述 1

第一篇 遗迹遗存

第一章 古生物与古人类化石出

土地 11

第一节 辽宁中生代脊椎动物
化石出土地 11第二节 辽宁第四纪哺乳动物
化石出土地 14

第三节 古人类化石出土地 15

第二章 遗 址 15

第一节 古遗址 16

第二节 古窖藏址矿冶与窑址 43

第三节 其他类遗址 51

第四节 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址 56

第三章 古城址 59

第一节 平地城 60

第二节 山 城 84

第三节 长城与边墙址 98

第四章 墓 葬 102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墓 102

第二节 青铜时代墓 106

第三节 战国时代墓 116

第四节 汉代墓 121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墓 131

第六节 隋唐墓 139

第七节 辽金元墓 143

第八节 明清墓 160

第九节 民国时期墓 166

第十节 殉难墓地与烈士陵园 167

第五章 建 筑 170

第一节 沈阳故宫 170

第二节 寺庙 宫观 祠堂 171

第三节 古塔与纪念塔 197

第四节 台坊楼桥 210

第五节 帅府 公馆 别墅 公用
建筑 214

第六节 石窟与摩崖造像 218

第六章 石 刻 221

第一节 造像题记与经幢 221

第二节 石函 塔铭 塔碑 232

第三节 寺庙碑 宫观碑 祠堂
碑 250

第四节 墓碑 墓表 287

第五节 墓 志 300

第六节 其他碑刻 366

第七节 别 录 386

第二篇 文物藏品

第一章 石器与玉器 423

第一节 石 器 424

第二节 玉 器 427

第二章 金属器具 436

第一节 铜铁器 436

第二节 金银器 462

第三节 鍍金银器与错金银器 466

第三章 陶瓷器	472	第六节 古乐器	694
第一节 陶 器	472	第七节 宫廷遗物	695
第二节 釉陶器	477	第八节 战争遗物及纪念物	698
第三节 瓷 器	487	第九节 名人之物	708
第四章 书 画	499	第十节 烈士遗物	718
第一节 法 书	500	第十一节 杂 品	720
第二节 绘 画	524	第三篇 文物事业	
第五章 织 绣	576	第一章 文物管理机构	725
第一节 织成与缣丝	577	第一节 行政管理机构	725
第二节 刺 绣	584	第二节 文物事业单位	727
第三节 彩绮色绢	588	第二章 文物保护	735
第六章 雕塑与其他工艺品	589	第一节 文物保护单位	736
第一节 雕 刻	590	第二节 建筑维修与文物技术保 护	739
第二节 雕 塑	595	第三章 考古调查与考古发掘 ..	744
第三节 煤精与琥珀制品	597	第一节 考古调查	745
第四节 漆器与珐琅器	599	第二节 考古发掘	749
第七章 货币与钱范	600	第四章 文物征集与陈列展览 ..	755
第一节 货 币	601	第一节 文物征集	755
第二节 钱范与票版	640	第二节 陈列展览	763
第八章 铜镜与印玺	643	第五章 学术研究	774
第一节 铜 镜	644	第一节 学术团体	774
第二节 印 玺	659	第二节 学术交流	775
第九章 其他藏品	672	第三节 研究成果	777
第一节 档案 舆图 信札	673	附 录	
第二节 甲 骨	688	一、大事年表	783
第三节 骨器 木器	690	二、重要文献辑存	805
第四节 砖 瓦	691	三、编纂始末	816
第五节 玻璃器	693		

概 述

辽宁,地处祖国的东北边疆,与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毗邻,是中原连接东北亚大陆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辽宁地区行政建置沿革始于燕国,置辽东、辽西二郡,其中辽东郡首府治襄平(今辽阳)。秦汉承袭燕制,为辽东、辽西两郡和右北平郡、玄菟郡一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辽东以襄平为中心,出现公孙氏割据;辽西以龙城(今朝阳)为中心,先后建有前燕、后燕、北燕政权。5世纪初,玄菟、辽东两郡为高句丽所据有。唐总章元年(668年)灭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管辖辽东;辽西有营州都督府,属河北道。辽代属东京道、中京道和上京道一部分,东京即今辽阳。金代辽宁东南部属东京路,北、西部各属咸平路、北京路。元代属辽阳等处行中书省的辽阳路、沈阳路、广宁路及咸平府。明代废辽阳行省,专设“辽东都指挥使司”,下辖卫所。明末,后金国从赫图阿拉(今新宾老城)迁都辽阳,后迁都沈阳,更名“盛京”。清入关后,辽宁地区隶属盛京将军府。清末设奉天省,民国18年(1929年)改为辽宁省。

辽宁地区的文物博物馆工作首先是从考古发掘工作开始的。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辽宁逐渐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止,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除了瑞典人安特生等人之外,在辽宁及东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的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鸟居龙藏于清光绪二十一年首先进入辽宁进行考古调查,此后,相继有近百余名日本学者、军人对辽宁,尤其是对大连地区和辽西地区进行大量考古调查和发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成立“满鲜历史调查部”,民国15年(1926年)成立“东亚考古学会”,民国22年(1933年)日本又借口“代替中国人保护文化财产”成立“满日文化协会”,对辽东半岛大连地区,乃至吉、黑两省和内蒙古东部与朝鲜北部,进行大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这一时期,由中国人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首先是从赤峰市郊红山开始的。民国19年(1930年),梁思永在赤峰附近的英金河流域调查了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46年,裴文中在其著述《中国之彩陶文化》一文里,论述了赤峰一期文化与中国彩陶文化的关系。赤峰一期文化后由尹达于1955年出版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命名为“红山文化”。其次还有李文信主持发掘的沈阳塔湾辽金墓、沈阳砂山子辽金墓、叶柏寿车站辽墓、建平辽郑恪墓、辽阳北园汉壁画墓等,同时还调查了内蒙古的燕秦长城,为辽西古长城研究奠定了考古学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物博物馆工作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辽宁省的文物机构逐步健全,绝大部分市县相继成立了文物管理机构,与此同时,辽宁文物博物馆事业也发展起来。早在1949年7月7日建立的东北博物馆(1959年更名为辽宁省博物馆),以及1951年和1952年先后在旅顺和沈阳成立的“旅顺历史文物博物馆”

(1954年更名为旅顺博物馆)和“故宫陈列所”(1954年更名为沈阳故宫博物馆),成为辽宁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基础,并称“辽宁三大馆”。这三大博物馆以馆藏文物丰富、档次高而享誉国内外。辽宁省博物馆的馆藏唐宋书法、绘画、宋元缂丝以及商周青铜器、辽代文物;沈阳故宫博物馆馆藏清代宫廷文物;旅顺博物馆馆藏甲骨文、新疆文物、外国艺术品等,堪称稀世珍品。

1954年辽宁省博物馆成立了文物工作队,对全省开展了文物普查与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从1956年开始到1985年,30年间,全省进行的大规模文物普查共有三次,共确认辽宁省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文物遗存11300余处。1961、1982年国务院先后公布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辽宁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5处;1963年9月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8处;1979年辽宁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1处;同时,各市县(区)人民政府也先后公布了市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对全省进行文物普查的同时,积极配合国家基本建设工程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为科学研究进行的有计划的重点发掘工作,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984年在濒临渤海的海城县永安乡金牛山的洞穴中,发现了距今26万年的一具相当完整的男性颅骨及体骨,其体质特征比同时期北京周口店人进步,命名为“金牛山人”,该发现是世界人类学史上罕见的发现,被评为1984年世界十大科技成果之一。略晚于金牛山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在辽东山区还有本溪的庙后山洞穴,其年代距今约14至24万年以上。旧石器中期的遗址,则有辽西喀左县水泉乡鸽子洞,距今约5至10万年,旧石器晚期的海城小孤山洞穴遗址,距今2至4万年,这些旧石器时代人类洞穴遗迹,具体反映了先人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生活面貌。辽宁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书写着中华民族新的历史篇章。以“之”字形篦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新乐文化,已掌握了制作精美玉器及煤精、木雕等工艺品的高超技术。在建平牛河梁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女神庙、积石冢群、祭坛和金字塔式积石巨型建筑,特别是出土的形神兼备的女神头像和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猪龙、玉璧等精美玉器及红色彩陶器,显示了牛河梁新石器遗址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史前礼仪性建筑群址。

辽宁地区是夏商周三代重要的方国所在,早期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有连续数十里的连锁式城堡群,具有一定的国家规模,是北方地区方国的重要代表。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魏营子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等青铜时代文化在辽西、辽东广泛分布;商周之际,辽西地区发现有6处窖藏,出土了近60件窖藏青铜器,集中分布于大凌河上游的喀左县境内。出土的几乎全部都是大型青铜礼器,且多铸有族徽、族名一类铭文,是研究辽宁地区古民族、古方国的重要资料。其中孤竹壘的出土,证实了商代孤竹国的所在与辽西有关。燕侯盃和受燕侯赏赐的诸族铜器的出土更说明,燕受封之始就将势力扩展到辽西,印证了《左传·昭公九年》“昔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记载的可信性。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带有区域特色和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青铜器,辽河流域是北方青铜器分布的东区,这一地域出土的戈、戚一类多附铤和以动物头部为装饰,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及其与中原商周青铜文化的密切交往关系。

从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末期,在辽宁及其周边地区流行一种有别于中原直刃式青铜剑的曲刃式青铜短剑,含有这种短剑的遗存被称为“青铜短剑文化”,它以柱脊曲刃剑身、T字形剑把手和分体组装为特点,在辽宁境内有广泛的分布,并且可以划分为辽西、辽东两地的不同类型。

辽西地区的青铜短剑文化以辽河流域为中心,分布范围西起努鲁儿虎山,东至医巫闾山,北自柳河上游,南达山海关。大致可分为三期遗存:第一期,以喀左和尚沟曲刃短剑墓为代表,时代可确定为西周至春秋早期;第二期,以朝阳十二台营子和喀左南洞沟石椁墓为代表,上限自春秋中期,下限不晚于战国早期;第三期,以凌源三官甸子和喀左老爷庙墓为代表,年代约相当于战国早期至战国中期前后。与曲刃青铜短剑伴出的有多钮铜镜、生产工具、车马器和各式装饰品。

辽东地区的青铜短剑文化主要特点是,普遍采用石棺墓制,早期遗存中尤以“大石棚”最为著名,沿辽阳、海城、营口、盖县到辽东半岛南端一线分布,成为半岛的一大奇观。根据石棚中出土遗物判断,当属青铜时代遗存,其文化性质与辽东地区的青铜短剑墓有密切联系。辽东半岛曲刃短剑墓前期以旅大后城驿岗上、楼上积石墓为代表;后期以辽阳亮甲山土坑墓和旅顺尹家村12号石椁墓为代表,具有独特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沈阳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大墓,即6512号墓是所发掘的出土文物最多的一例,共出土青铜短剑,双钮铜镜及各类马具797件,时代相当于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其族属或为东胡,或为秽貊。

辽宁青铜短剑文化在东北青铜文化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使东北地区青铜文化在形成地域特色的同时,仍保持和中原地区同步发展的趋势。

秦汉之际,中原与北方民族、地方郡县与中原王朝的接触逐渐频繁起来,对此除有大量文献记载外,在辽宁绥中县止锚湾发现一巨大的秦汉建筑遗址,它是一处以石碑地为中心,止锚湾、黑山头为两翼组成的一宫双阙的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再加上周围的附属建筑,面积达25平方公里。整个遗址是一处具有苑囿和礼仪性质的大型行宫遗址,据考证,为秦始皇东巡碣石,“择地作东门”的帝国国门之所在,因而被定名为碣石宫。

秦汉及其以后,活跃于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匈奴、鲜卑、高句丽、契丹、女真等族先后建国,在辽宁地区遗留下丰富的文化资源。

在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东北各民族在秦汉时期开始从落后状态中加速进步。在辽宁西丰西岔沟近千座墓葬组成的古墓群中,出土了大量的长矛、短剑、刀、响箭等成套的铁兵器和马具,墓葬中存在的殉马习俗,反映出这是一个善骑射、驯马的民族。此外,还有少数铁镢、铁锄等农具,说明当时东北的游牧民族在从事游牧业以外,同时兼营部分农业。同出的西汉铜镜及汉五铢钱,表明这些游牧民族已经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而普遍出土的一种用于皮带上绞具的雕花铜饰牌,或以鹰虎搏斗、或以兽畜撕咬、或以畜犬追逐等动物花纹装饰,形象写实,动感强,多变化,一派草原风格,透露着骑马民族那种“引弓之国,控弦之士,朝发夕至,来去无定”的放牧、射猎与征战生涯,同类遗存也见于广大蒙古草原。汉武帝时在辽东设沧海、玄菟、乐浪、朝鲜四郡,直接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播于高句丽、扶余等族,使其生产力迅速提高,并建立了强盛的地方政权。汉以后,中央王朝失去了对辽东的控

制能力,辽宁乃至东北地区遂成为慕容鲜卑和高句丽争夺之地。

公元3世纪,兴起于内蒙古东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鲜卑族的一支慕容氏,先后在辽宁西部建立前燕、北燕和后燕国。三燕的文化遗存,大量地发现于辽宁朝阳的一批墓葬中。朝阳是三燕(前燕、后燕和北燕)的都城所在,在三燕都城——龙城(今朝阳)一带的慕容鲜卑墓葬中,经常出土金步摇等金饰品,出土的甲冑、弓箭等武器以及鞍、镫等多种马具,均具有慕容鲜卑的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北燕宰相冯素弗及其妻属墓葬(年代为公元415年),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一副鎏金木芯马镫,是惟一有绝对年代可考的马镫。另外一件步摇金珰,上有一佛二菩萨的形象,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佛像资料。所出的玻璃器皿,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在义县城北大凌河畔开凿的万佛堂石窟,其造像可与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相媲美。

辽宁作为高句丽早期活动地区,其遗存以辽东地区的桓仁五女山城和附近的积石墓群为代表。分布于辽东山地的诸多高句丽山城中,以周边长15公里的凤城县凤凰山城规模最大,该城是高句丽于公元5世纪前后东迁后通向辽东的重镇。

公元7世纪以后,契丹族在西辽河流域崛起,10世纪初建立辽国,形成与宋王朝南北对峙局面。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在古文化上独树一帜,辽代陶瓷、纺织工艺品、金银器、玉器、绘画、雕塑等遗存于世的各类文物,既印证着汉文化对契丹族的影响,又体现出本民族强烈的文化气息。遍布在辽宁各地的117座有据可考的辽代州县城址及周围密集的墓群,以及辽代寺、塔、经幢、画像石刻等,在辽宁处处可见。1974年法库叶茂台7号墓出土了数百件珍贵的文物,最为罕见的是置放石棺的小木帐左右压槽悬挂的两幅古画和尸体覆盖的缙丝龙纹衾被,至今尚保存得相当完好。辽代砖结构的佛塔在辽宁有近40座,它们大都分布在州城附近,朝阳城内的北塔和南塔仍都保持了唐代的方形塔座。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是现存辽代单体建筑中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其木构梁架十分高大,斗拱硕大无比,整体风格粗犷豪放,是辽代木结构建筑的代表作品。

金代建置多承袭辽制,也实行五京制,地方行政区划分府、州、县。金代城址多系利用辽代城址。遗址有新民前当铺、鞍山陶官屯、绥中城后村等;金墓有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马令夫妻合葬墓等;有明确纪年的凌源天盛号石拱桥、凌源金中都天官院法师幢记和辽阳出土的《英公禅师塔铭》及《通慧圆明大师塔铭》,记录了珍贵的史料。

元明清三代,各少数民族逐鹿中原的硝烟消散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之中,元代修建的北镇庙,成为明清两代帝王继承大统祈祷消灾的拜祭场所,至今在庙内遗留有元明清三代王朝皇帝遣官祭祀碑。旅顺博物馆藏元代的张成碑,记录着祖国东北边陲元代的行政设置——水达达路。民国初年在鞍山千山倪家台出土后下落不明的崔源墓志和辽阳博物馆藏的“宋国忠墓志”,记载了明王朝招谕奴儿干的活动,是研究明王朝东北边疆,特别是奴儿干地区的重要资料。起源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各部经历兼并、统一,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在辽东建立后金国。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为大清,辽宁从此成为清王朝的肇兴基地。现存沈阳的一宫两陵建筑以及抚顺新宾老城遗址和永陵就是这一历史见证。

乾隆、嘉庆以后,清王朝逐渐衰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大连湾开始,古老的营口被迫开埠,大连、旅顺先后成为沙俄、日本租借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取代沙俄占领旅大地区,开始了长达40年的殖民统治。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证——日俄战争日军登陆的花园口遗址、旅顺日俄战争遗址、旅顺日俄监狱、万忠墓、沈阳柳条湖“九一八”事变发生地、抚顺平顶山惨案地、阜新万人坑等,仍存于辽宁各地。帝国主义的统治,激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各地民众与爱国志士进行了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营口西炮台、锦州昭忠祠、抚顺宣判日本战犯法庭遗址等,以及解放战争中的各地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塔,都已成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辽宁作为多民族文化精粹汇集之地,它既有经常接受中原文化的一面,也有与中原文化同步发展、相互影响的一面,在一些重要历史发展阶段,辽宁地区通过玉器之路、青铜之路、骑马文化之路,使东北文化发展的每个脚步都涉及至广大东北亚地区。在形成区域特色的同时,东北文化对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以至整个东方文明的形成发展,曾发挥过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新中国建国36年来的文物考古事业,丰富了辽宁的文物资源,充实了历史的积淀,犹如揭开层层尘封的史书,擦亮历史这面古镜,展示辽宁乃至中国文明发展的风貌和光彩。

第一篇 遗迹遗存

